

延安时期电影中的党建元素及其对当代党员教育的价值启示

■文/王玮华

延安时期,在民族危亡与革命浪潮交织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不仅引领着武装斗争与社会变革,更在文艺领域开辟了服务革命、凝聚民心的重要阵地。电影作为当时新兴的文艺载体,凭借其直观生动的叙事特性,成为了党传递思想主张、塑造精神内核的关键媒介。

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延安逐渐成为了革命圣地与文化中心。面对民族救亡与革命建设的双重任务,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的社会功能,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电影作为直观、生动的传播媒介,被赋予了宣传党的主张、凝聚革命力量的使命。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其党建元素的生成源于三重逻辑:一是革命实践的直接反映,电影内容多取材于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土地革命与生产建设;二是意识形态的塑造需求,通过影像化叙事构建党的政治认同;三是群众教育的现实需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工农兵群体传递党的理论与政策。具体而言,延安时期电影中党建元素的呈现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四种。

其一,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延安时期的电影始终将“党的领导”作为叙事核心。电影《南泥湾》(1941)就通过展现八路军在党的号召下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场景,突出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与党的决策对革命实践的决定性影响,从开垦荒地的组织动员到生产技术的革新推广,均以党的领导为叙事主线,强化了“党是革命事业领导核心”的认知。《白毛女》(1945,舞台电影版)中,喜儿的翻身解放历程始终与“共产党来了”的叙事逻辑紧密结合,将个人命运的改变归因于党的领导,直观呈现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社会”的核心思想。

其二,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延安时期电影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叙事视角,生动诠释了这一党建原则。《兄妹开荒》(1943)以陕北农民的生产生活为原型,展现党是如何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大生产的,片中党员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场景,打破了干群隔阂的刻板印象,实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宗旨的具象化呈现。《小二黑结婚》(1949)则通过农村青年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反映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是如何打破封建束缚,体现党“代表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这一立场的。

其三,革命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党的精神支柱,延安时期电影以具象化情节传递革命信仰的力量。《延安与八路军》(1938)通过记录八路军将士在党的领导下奔赴抗日前线的历程,展现了八路军将士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崇高理想,其中党员冲锋在前、舍生取义镜头,将“共产主义信仰”转化为了可感可知的英雄形象。《白求恩大夫》(1940,纪录片片段)中,外国共产党员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事迹,被提炼为“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符号,成为了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材。

其四,艰苦奋斗作风。延安时期的电影以朴素的镜头语言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南泥湾》(1941)中,战士们在缺衣少食的条件下开垦荒地、纺纱织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用实践场景诠释了艰苦奋斗的内涵。《抗大》(1942)记录了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在窑洞上课、露天训练的场景,展现了党员干部“在艰苦中学习、在学习中奋斗”的精神状态,将作风建设融入到了日常叙事中。

当代党员教育面临价值多元与思想引领的双重挑战,重申延安时期电影党建元素的生成逻辑与呈现形态,不仅能解码党的建设在文艺领域的早期实践智慧,更能为新时代党员教育提供从历史资源中汲取精神养分、创新教育范式的重要镜鉴,其启示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延安时期的电影将抽象理念转化为了具象化的影像叙事,生动展现了革命先辈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和完成民族解放事业,不畏牺牲、奋勇向前的英雄事迹。这种由宏大理想转为微观实践的转化逻辑,为当代党员教育提供重要镜鉴。当前可系统梳理延安电影中理想信念的相关素材,以影视党课的形式组织党员观看延安时期电影中战士们在党旗下宣誓开荒的片段,结合“重走长征路”的沉浸式体验,让党员感受信仰的力量。同时需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将“翻身解放”的期盼,与脱贫攻坚中“一个都不能少”的实践进行对照,制作“理想照进现实”的主题纪录片,引导党员从感知信仰到理解信仰再到践行信仰,在历史叙事与现实成就的相互印证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价值认同,使理想信念教育从单向

灌输升华为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

其次,深化宗旨意识培育。延安时期电影中干部与群众共同奋斗的场景,通过生活化叙事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范本。这些电影中党员干部心系群众、为群众谋福祉的形象,能使新时代党员深刻认识到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在党员教育中,应结合这些电影素材,开展宗旨意识专题教育,组织党员学习电影中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的事迹,引导党员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实际教育活动中,可开展实践对标活动,引导党员对照影片中“干部背背过河”的担当行为,反思自身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作为,推动宗旨意识从情感共鸣升华为行动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再次,推动作风建设传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些作风在当时的电影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新时代党员教育应从这些电影中汲取作风建设的养分,教育引导党员传承并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可开展“光影中的作风课堂”系列活动,选取延安时期电影中军民垦荒的纪实片段、党员干部深入农户了解民生疾苦的场景,组织党员学习并对照自身工作中是否存在照搬照抄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还可实施“作风传承实践工程”,以延安时期电影中的作风典范为参照,设计实践任务,每月形成一份作风对照清单,对照党员的纪律要求,自查自身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

延安时期电影中的党建元素,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历史时期对自身性质、宗旨与作风的艺术表达,其核心在于通过具象化叙事构建党的形象认同与价值认同。在新时代党员教育中,深入挖掘延安时期电影中党建元素的精神内核,既能传承党的红色基因,又能为党员教育注入历史精神与情感温度。未来,党员教育可继续探索红色电影的教育价值,依托红色电影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的传播特点,实现新时代党员教育的创新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延安干部学院)
基金项目:延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时代推动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研究,立项号:23CDD16。

英语电影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文/李圣恩 张小萍

在“双一流”建设与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早已超越工具导向式教育范畴,转为全人教育与能力本位教育;也更加聚焦于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工作,注重提升其跨文化沟通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这对以语言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英语电影作为集语言符号、文化意象、情感体验于一体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其多模态呈现方式与沉浸式学习场景,恰好呼应了大学英语教学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诉求。

克拉申的可理解性输入理论与莱维特的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均表明,真实语境中的语言接触与文化观察是个体掌握高阶语言能力的关键路径。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英语电影的应用优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供真实自然的语言输入。英语电影中的对话涵盖了口语表达、俚语、习语等实用性语言形式,弥补了教材中标准化文本灵活性不足的劣势。电影《哈利波特》系列中大量的日常对话既包含基础词汇,又渗透着英式表达习惯。而《死亡诗社》中的课堂辩论场景则展现了学术英语的逻辑结构与修辞技巧。这种多样化的语言输入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自然语感,理解不同语境下的语言变体,弥补传统教材中“理想化语言文本”的不足之处。二是深化跨文化认知与交际能力。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电影则是文化的镜像。英语电影通过场景、服饰、习俗等细节展现着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与社交规范。《怦然心动》中父女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对话体现了西方哲学中的个体主义思想。《相助》则通过描述种族问题,揭示了美国历史文化的复杂性。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此类文化符号,可帮助学生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偏差,理解个人空间、直接表达等文化差异,从而提升跨文化敏感度。三是激发学习动机与情感共鸣。电影的故事性与艺术性能够激活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其从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探索。将英语专业教学内容与电影故事情感体验相结合,可有效提升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记忆留存率。在用《心灵奇旅》开展教学活动时,学生通过分析主角对生命意义的探讨,不仅能练习自身的听力与口语能力,还能结合自身经历加以讨论,使英语学习与自我认知形成联动。

基于英语电影在语言输入、文化渗透及兴趣激发等方面的显著优势,大学英语教师需兼顾英语教学规律、

学生认知特点与电影资源的特性,从素材筛选的科学性、活动设计的多元性及教学模式的创新性三个维度构建教学策略。

结合英语教学目标科学选择英语电影素材。备课阶段,英语教师需始始终紧密联系当前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进行电影选材,遵循语言难度适配性、主题相关性、文化代表性三大核心原则,形成系统性的电影素材筛选框架。首先,英语电影素材的筛选要契合当前英语教学阶段的难度水平,即所选影片的语言难度应略高于学生现有水平,既避免过难导致学生产生挫败感,又防止过易丧失学习价值。大一初级阶段可优先选择动画电影,其语速平缓、词汇复现率高、句式简单,搭配生动的画面可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大二、大三进阶阶段则需匹配语言复杂度有所提升的素材。《国王的演讲》作为标准英语范本,包含大量修辞格和正式语体,适用于语音语调矫正与学术英语训练。而《社交网络》中的快速对话、行业术语及法律文书式表达,可用于培养专业场景下的听力能力和信息抓取能力。其次,英语电影素材的选择可结合当前英语单元的教学目标。当教学单元涉及特定话题时,选取主题契合的影片能够强化学生的知识联结。讲解“跨文化沟通”单元知识时,《绿皮书》中的跨种族对话场景可直观呈现语言使用的社会语境(如黑人英语与标准美语的差异)。而在探讨“科技与人文”话题时,《她》中人与人工智能的情感交流片段,可引导学生分析虚拟交际的语言特征。最后,可优先选择能够映射英语文化核心特质的作品,构建深度文化认知路径。

设计多样化课堂活动以有机导入英语电影素材。英语教师需兼顾英语课堂的专业性和生动性,利用多元课堂活动实现语言输入与输出的有机结合。英语教师可设计分段精听和跟读活动,以英语电影片段为载体开展基础语言训练。教师需先隐去字幕播放片段,要求学生记录核心信息与情感基调,然后逐句播放并显示双语字幕,引导学生标注连读、弱读等语音现象,同步解析台词中的习语,最后通过影子跟读法强化语音模仿,要求学生在跟读中还原语调起伏与情感重音。这个精听和跟读的过程,不仅能帮助学生强化语音语调的听觉表征,更能通过视觉画面与语言符号的关联,深化学生对语言输出形式和语境意义的理解。此外,教师也可以聚焦英语交际

应用,设计角色扮演活动。

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以英语电影为载体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在课前预习阶段,英语教师可以依托超星学习通、雨课堂等学习管理平台发布经过剪辑的英语电影片段以及对应的词汇表和文化背景资料,然后配套设计多样化预习任务,包括布置首抓核心信息、标注高频短语、检索美国社区学院制度等任务,要求学生通过绘制思维导图梳理人物对话的逻辑关系。课程中,以问题导向,以任务驱动为设计原则,要求学生将课前完成的学习任务进行简单的分组汇报,然后教师针对各组的汇报内容进行针对性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电影片段蕴含的语言知识与文化内涵。针对美国社区学院制度检索任务,教师可追问“该制度与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有何异同”“电影中哪些对话细节体现了这一制度特征”等问题,激活学生的跨文化比较思维。接着组织电影场景重现小组活动,让学生自选电影片段进行配音或脱稿表演,重点关注语音语调、肢体语言与情感表达的契合度。教师利用希沃白板实时标注学生表演中的语言亮点与需要改进之处,同步投屏展示典型例句的语法结构分析图。课后阶段,教师可发布延伸任务,要求学生撰写电影语言学习日志,记录课程中发现的3个特色表达及其使用语境,或设置文化细节寻宝任务,让学生自主发现并标注课前资料未覆盖的文化知识点。同时在课后开放线上答疑区,针对课程辩论中的争议点和影片中的共性问题进行专项讲解,还可发布微视频解析电影中高频出现的连读、弱读等语音现象,帮助学生巩固课上所学的语言技能。

英语电影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打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为语言输入、文化感知与学习动机激发提供了创新路径,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更在于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在未来的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可继续深入挖掘英语电影的教学价值,让英语电影不仅充当英语学习的拓展类文本资料,更作为语言学习的生活化载体,融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李圣恩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张小萍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
课题项目: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4年度课题“高等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GH24Y2330)。

影视作品助力中西方音乐文化融合发展

■文/李振璐 姚琴

视音乐的多元化、类型化特征已非常明确,不仅涵盖了古典、爵士、摇滚、电子等多种音乐风格,还广泛运用了合成器、采样等现代技术,使得配乐形式丰富多样,极具流行性和商业性。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同样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中国电影早期配乐多以民族乐器为主,注重旋律优美和情感抒发,如《党的女儿》《地道战》《上甘岭》等影片的配乐就充满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影视音乐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影视音乐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音乐的创作理念和技术手段,实现了民族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融合创新。例如影片《卧虎藏龙》的配乐,就将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交响乐巧妙结合,营造出了独特的东方韵味,获得了国际赞誉。

当前,中国影视音乐在保持民族性、艺术性的同时,更应注重与国际接

轨,探索更多元化的表达方式,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在实际编曲和应用中,以影视作品推动中西方音乐文化融合发展,可从乐曲融合、乐器融合等方面展开探索和实践。如中法合拍电影《狼图腾》,其配乐将蒙古族音乐与西方交响乐结合,成功将文化自主意识与世界思维范式结合,为观众带来了独特的视听体验。再如国产动画电影《黑猫》《哪吒之魔童降世》,其配乐同样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为影片增添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并精准勾勒了角色的情感变化和心理活动。影片中元鼎缓缓下沉的一幕,伴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背景音乐,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片段在配乐设计上,创作者运用了“蒙古呼麦”这一独特唱法,并融入了低沉的梵音、不确定性敲击乐与极具现代感的电子乐,营造出了一宏大且立体的压迫感。而在哪吒登场这一幕,创作者大胆采用八支唢呐的乐器配置,将西

乐团与民乐团完美融合,不同类型的唢呐齐鸣,辅以电吉它等现代乐器,使哪吒登场的瞬间以及最终大战的壮观场面,都伴随着震撼人心的音乐,将观众带入了超燃的场面。除了直观运用中西音乐和乐器,部分影视作品还从视听符号的转型着手,将抽象音乐文化转化为具象感官体验,以降低跨文化接受门槛。以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为例,作曲家谭盾将中国二胡的呜咽音色与西方古典交响乐的宏大织体相结合,在竹林打斗场景中,宏大的滑音模拟剑刃破空的声响,弦乐群的震音则构建起了东方武侠的苍茫意境,音画同构处理使西方观众无需理解文化背景,即可通过视觉叙事感受音乐的情感张力。此外,影视作品自身的产业链延伸能力也能成为中西方音乐融合创造可持续的商业生态。比如迪士尼动画电影《寻龙传说》的配乐就将中国五声音阶和好莱坞交响乐团模式混搭,其原

声带不仅登上了Billboard世界音乐榜,更衍生出了全球巡演项目,如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演出,这种影视音乐产品与线上音乐平台和线下演出的产业联动,使跨文化音乐创作得以被更多人所认知和接受。

用影视作品助力中西方音乐文化融合发展也面临着不可忽视的挑战,部分影视作品将中西方音乐元素简化为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的模式化组合,如好莱坞电影在表现中国场景时,机械性叠加古筝扫弦与编钟音色,缺乏对文化内涵的深度挖掘,导致音乐成为了视觉符号的附庸。此外,流媒体时代数据驱动的创作趋势使得部分影视配乐倾向于迎合大众口味,如英国产剧为追求海外播放量,使传统乐器的音色过度电子化,削弱了音乐的文化本真性,引发了“伪融合”争议。应对上述挑战,我国影视音乐创作者应从文化理解、创作理念等角度着手,例如在表

现中国音乐元素时,不仅关注古筝、编钟等乐器的音色,更探究其在传统礼乐制度中的象征意义,将“中和之美”“天人合一”等文化内核融入配乐创作中,而在西方音乐的运用上,精准把握爵士乐的即兴精神、古典音乐的理性结构,实现文化符号与音乐表达的深度融合。在传播方面,影视发行商针对不同文化受众设计差异化的音乐叙事方式。例如,在面向西方观众的影视作品

中,用简短的幕后故事讲解音乐元素的文化渊源,在海外发行时邀请当地音乐家参与配乐改编等。

未来,影视作品在中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将扮演越发重要的角色。期待未来能有更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通过音乐这一共通语言,促进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借鉴,共同构建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全世界音乐文化图景。

(李振璐系宁夏师范大学副教授,姚琴系宁夏师范大学副教授)【基金项目】2023年度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艺术学)(曲子戏与六盘山地区民俗文化关系研究)(批准号:23NXBYCDB07)立项人:李振璐。

《对联》杂志征订信息

《对联》杂志(原名《对联 民间对联故事》)创刊于1985年1月,由山西日报社主管。以教育普及、传承发展、学术研究为核心,面向社会大众,普及对联知识,提高鉴赏能力和创作水平。突出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实用性。

国内统一刊号:CN14-1389/

国内邮发代号:22-88

定价:月刊,120元/年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均可

十本以上集体订阅,直接联系《对联》期刊社

征订热线:15735155820 13269221236

广告